

J I N A N S H I X U

【第一辑】

纪宗安 汤开建 主编

暨南史话

道堂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暨南史学

第一辑

纪宗安 汤开建 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暨南史学(第一辑)/纪宗安,汤开建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11
ISBN 7-81079-202-4

I. 暨… II. ①纪…②汤… III. ①中外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亚州 - 古代 - 文集②中国 - 历史 - 研究 - 文集

IV. ①D829.3-53②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5058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编辑部 (8620) 85228986 85228960 85226593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0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暨南大学印刷厂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25.25
字 数：605 千
版 次：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1—800 册

定 价：8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暨南史学》指导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韦庆远（北京） 西田龙雄（日本） 朱维铮（上海） 朴元熸（韩国）
陈高华（北京） 陈得芝（江苏） 陈学霖（美国） 邱树森（广东）
张 磊（广东） 季塔连科（俄国） 饶宗颐（香港） 姜伯勤（广东）
黄时鉴（浙江） 萧启庆（台湾） 萨安东（葡萄牙） 蔡鸿生（广东）

《暨南史学》编辑委员会

主 编：纪宗安 汤开建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明达 王新民 汤开建 纪宗安

陈伟明 张其凡 张晓辉 曹云华

执行编辑：陈文源 王元林

前 言

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暨南大学，其校名源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暨南自建校以来，迭遭搬迁，一直以“宏教泽而系侨情”为办学宗旨，以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1927年，暨南成为民国时期成立较早的少有的国立大学之一，同年即成立了由黄凌霜先生任系主任的历史社会学系，谭其骧先生等成为首批学生。同时，郑洪年校长还成立了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与大学部、中学部鼎足而三。

暨南素有深厚悠久的国学传统，一批著名的史学家曾先后任教暨南，如何炳松、周谷城、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沈练之、丁山、胡厚宣、陈序经、朱杰勤、陈乐素、金应熙等；暨南一直是华侨与南洋问题的研究中心，刘士木、李长傅、温雄飞等在南洋史、华侨史领域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58年暨南在广州重建，长期积淀的国学传统得到嗣承，暨南大学的史学研究除了继续从事东南亚史及华侨史研究外，宋史、元史、明清史、中外关系史、边疆民族史、港澳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基督教史和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又成为国内史学研究的强项，现拥有一批海内外知名学者，一批已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学术成果，和专门史、中国古代史博士点与3个硕士点。“暨南史学”业已成长为中国史学研究领域中一支独具特色且实力强劲的史学队伍。

再过四年，暨南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近百年的厚重历史既为我们孕育了传统，又一次次地将传统割裂。今天，重建暨南史学的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倍感任重道远，希望本校史学同仁齐心协力，并祈望获得海内外史学名家的扶助和指导，共同铸造真正的“暨南史学”丰碑。

纪宗安 汤开建

二〇〇二年九月六日

暨南史学第一辑目录

| | |
|--|---------------------|
| 前 言 | 纪宗安 汤开建 (1) |
| 从欧亚大陆的史前语言接触看汉藏语系的起源问题 | 徐文堪 (1) |
| 朝鲜开国神话中的中华文化痕迹 | 高伟浓 (9) |
| 周穆王、唐太宗骏马名号语源考 | 芮传明 (19) |
| 高句丽三京考 | 熊义民 (30) |
| 空海入唐与日本国书初探 | 韩 昇 (38) |
| 党项源流新证 | 汤开建 (52) |
| 唐宋家族制度嬗变原因试析 | 包伟民 (76) |
| 以北汉问题为核心的宋辽军事冲突 | 曾瑞龙 (94) |
| 陈瓘年谱 | 张其凡 金 强 (112) |
| 宋元时期白莲教与佛教净土信仰及摩尼教之关系 | 范立舟 (133) |
| 元朝科举诏令文书考 | 陈高华 (153) |
| 元英宗朝政治与南坡之变 | 王 颀 (173) |
| 明律“化外人”条试析 | 邱树森 (186) |
| 明清澳门内地移民的发展类型与人口构成 | 陈伟明 (194) |
| 吴昉著述考 | 马明达 (217) |
| 岭南园林与中外文化交流 | 纪宗安 孟宪军 (242) |
| 东南亚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 | 曹云华 (260) |
| 略论近代日本人在香港的经贸活动 (1845—1936) | 张晓辉 (279) |
| Hopo 的词源及其设立年代考 | 金国平 (292) |
| 耶稣会士鲁日满账本 | [比] 高华士编、赵殿红译 (300) |
| 方济各会中国教区中、西档案史料介绍 | 崔维孝 (326) |
| 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的环中国大旅行与中法外交交涉 | 耿 昇 (349) |
| 研究澳门土生葡人的珍贵史料—若尔热·福尔加斯《澳门土生葡人家庭》评介 | 李长森 (374) |

Contents

| | |
|---|--|
| Preface | <i>Ji Zong'an & Tang Kaijian</i> (1) |
| Origins of Sino – Tibetan and Prehistoric Language Contacts in Eurasia | <i>Xu Wenkan</i> (1) |
| Imprints of Chinese Culture in Korean Myths about Nation's Origin | <i>Gao Weinong</i> (9) |
| Original Names of Horses in the Possession of Zhou Muwang and Tang Taizong | <i>Rui Chuanming</i> (19) |
| Three Capitals in Koguryo | <i>Xiong Yimin</i> (30) |
| Pilot Study on Ku Kai's Going to Tang Empire and Japanese Credential | <i>Han Sheng</i> (38) |
| New Textual Research on Nation Origin of Dangxiang | <i>Tang Kaijian</i> (52) |
| Analysis on Causations of Involution of Familial System in Tang-Song Period | <i>Bao Weimin</i> (76) |
| Military Conflicts Focused on Northern Han between Song and Liao | <i>Zeng Ruilong</i> (94) |
| Chen Guan's Chronicle | <i>Zhang Qifan & Jin Qiang</i> (112) |
| Relationship between White Lotus, Clean Land Sects in Buddhism and Manicheism | <i>Fan Lizhou</i> (133) |
| Rescripts and Official Documents on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Yuan Dynasty .. | <i>Chen Gaohua</i> (153) |
| Politics during Yuan Yingzong's Ruling Period and Coup in Nanpo | <i>Wang Ting</i> (173) |
| Analysis on Items about Huawai People in Laws in Ming Dynasty | <i>Qiu Shusen</i> (186) |
| Developing Types and Population Forms of Immigrants from Inland China in Macao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i>Chen Weiming</i> (194) |
| Works Written by Wu Shu | <i>Ma Mingda</i> (217) |
| Gardens in Lingna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i>Ji Zong'an & Meng Xianjun</i> (242) |
| Historical Review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Overseas in Southeast Asia | <i>Cao Yunhua</i> (260) |
| On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Japanese Businessmen in Hong Kong in Modern Times(1845 – 1936)..... | <i>Zhang Xiaohui</i> (279) |
| Etymon of Hopo and the Time that Relative Yamun Was Set Up | <i>Jin Guoping</i> (292) |
| Account Book Kept by Missionary François de Rougemont | <i>Compiled by Noël Golvers, translated by Zhao Dianhong</i> (300) |
| Introduc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s by Francisca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in Sinitic Deanery | <i>Cui Weixiao</i> (326) |
| French Envoy Régis – Evariste Huc's Great Travels in China and Diplomatic Negoti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 <i>Geng Sheng</i> (349) |
| Valuable Historical Data for Study on Native Portuguese in Macao, Introduction of Book <i>Families of Native Portuguese in Macao</i> by Jorge Forjas | <i>Li Changsen</i> (374) |

从欧亚大陆的史前语言接触看 汉藏语系的起源问题

徐文堪

【提 要】关于现代人的起源问题，主要的争论存在于多区域性模型和单源模型即源于非洲之间。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我们也赞成非洲起源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选择了来自世界上 22 个不同地区的 1 000 多名男性，对他们的 Y 染色体进行分析，并排出基因变异的图谱，同时也对来自母系的遗传物质进行了排序。结果发现，不同人种有一位共同的非洲女性始祖，生活在 14.3 万年前，而人类的男性始祖则生活在 5.9 万年前。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科学家则选取了 53 名来自不同地区、种族、文化的实验者，对他们的全部线粒体 DNA 进行研究比较，从中发现：约 12 至 22 万年前，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人群是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大约在 2 至 8 万年前，大批人走出非洲迁徙到世界其他地区，取代了这些地区原有的人类。

根据基因研究，东亚地区南方人群遗传多样性非常丰富，而北方人群则相对较少，在 Y 染色体单倍型上仅拥有南方人群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推测，现代人在东亚的最早迁徙是由南向北。我们的非洲祖先到达东亚的时间可能是 6 万年前。他们首先居住在东南亚一带，而后逐渐向北迁徙，跨过长江、黄河，北及西伯利亚。语言学家把南亚语、澳台语（包括南岛语、卡岱语）、苗瑶语归入南方大语系（Austrie），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中亚居民在东亚北部某些居民在遗传学上的类似性，说明中亚地区的资料在研究东亚民族（包括南方与北方）的起源问题上具有极端重要性，这在今后应引起充分注意和重视。

在汉藏语系的起源和分类研究方面，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总的来说，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言上有所反映。中国新疆等地区从远古到中世纪早期的人种状况是欧罗巴型人种占优势。古代印欧语系语言，主要是吐火罗语，稍后还有印度—伊朗语族诸语，与主要是蒙古利亚人种类型诸族所说的汉藏系语言也有联系。至于汉藏语和阿尔泰语系诸语之间，也不能排除在发生学上存在着一定亲缘关系的可能性。

此外，俄国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汉—高加索语系”的概念，把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塞语包括在内。这个语系又可能与美洲印第安语的 Na—Dene 语系有关。美国学者最近更将巴斯克语、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苏美尔语（Sumerian）等语言的材料加入进去，从而为汉语具有更远古的语源关系提供了更进一步的线索。这个与中国境内语言的系属分类有关的 Dene—高加索大语系的推测，已经得到美国语言学家如葛林堡（J. Greenberg）的赞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因此，对汉藏语系的起源问题，应该从史前的全球语言联系特别是欧亚大陆的语言接触的角度重新审视。

通过基因分析,结合群体遗传学调查和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将逐步弄清欧亚大陆说同一语系和不同语系语言的族群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这方面的探索还刚刚起步,但前景广阔,我们期望在新世纪里获得长足进展。

【关键词】 汉藏语系 欧亚大陆 起源

关于现代人的起源问题,主要的争论存在于多区域性模型和单源模型即源于非洲之间。起源非洲的假说,目前在科学界占主导地位。自1997年德国等国科学家对19世纪发现的尼人化石作了DNA测定以后,意见更趋一致。2000年对格鲁吉亚和克罗地亚洞穴出土的尼人化石的检测,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近来时有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非洲起源说”提出质疑,并有一些新的发现。如英国《自然》周刊在2001年9月27日报道,中、美学者对北京以西150千米的河北省阳原县境内的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出土的石器进行了古地磁测定,推断其距今136万年^①,从而确知这是目前发现的东北亚最古老的石器。此外,在格鲁吉亚等地也有早于100万年且为学术界接受的旧石器文化发现。对西班牙人属先驱种(Homo antecessor)化石的研究,也颇引人注目。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非洲单一起源论”受到挑战,人类从非洲、亚洲等地分别独立起源、进化的学说,较易为人们所接受。其实,我们并不否认世界各地发现的能人、直立人和尼人等也可以归入“人”的范畴,但不能把它们视为现代人(Homo sapiens)的直系祖先。因为在生物学的分类上,能人、直立人、尼人、现代智人不是同一物种,而不同的物种之间,是不会发生自然演变的。

1998年秋季,中国学者褚嘉佑等人^②利用30个常染色体微卫星位点,分析了南北人群和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遗传结构,微卫星标记多态性和进化树聚类分析都支持现代中国和东亚人群来源于非洲,并经由东南亚进入中国大陆的结论。由于微卫星位点突变率较高,对研究较久远的人类进化事件和人群迁移有一定的局限性,宿兵等人^③又利用目前公认研究早期人类进化和迁移的理想工具Y染色体SNP的19种单倍型研究了其在中国人群中的分布,再次证实了东亚的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并由南方进入东亚而后向北方迁移。但是,中国大陆和东亚地区出土的人类化石形态上的连续性,一直被认为是支持现代人类多地区起源假说的有力依据。为研究该地区现代人类独立起源的可能性,柯越海等^④对来自中国各地的9988例男性随机样本进行M89, M130和YAP三个Y染色体单倍型的基因分型,这些突变型均来自另一Y染色体单倍型M168T。M168是除非洲以外所有现代人及部分非洲人共同具有的一种古老的突变型,在除非洲以外地区没有发现一例个体具有比M168更古老的突变型。经检测来自中国各地的近一万份样品全部具有M168的突变型,也就是全部都携带有来自非洲的“基因痕迹”,因此,Y染色体的证据并不支持现代中国人独立起源的假说,这也是目前支持现代中国人非洲起源假说的最新的遗传学证据。现在,他们使用的样本已增加到12127例,采自中国、东南亚、西伯利亚等地,进一步证实了全部东亚人群均起源于非洲(Science 292, 1051-1052, 2001)。

至于人类最近共同祖先生活的年代,按R. L. Cann等通过比较许多DNA样品,沿着母系血统追溯,可能在10至20万年以前。若按父系传递的Y型染色体追溯,则我们的共同祖先从非洲移居到世界各地是在35000年至89000年之前^⑤。语言的产生,无疑是人类进化

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王士元等^⑥认为这一划时代的突破发生在大约5万至6万年之前，这一结论跟考古学家的一些已有的发现和推论比较吻合，例如有证据表明人类约在5万年前第一次在航海技术上有了突破，能从非洲南部迁徙到澳大利亚。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洞穴艺术也是距今五六万年前的欧洲洞壁艺术，这表示那时已经有了艺术和宗教的萌芽。最近以色列海法大学的科学家在干涸的加利利湖床发现了一座几乎完整的村落遗址，距今约2万年，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类的生活状况，他们居住的小屋间隔最近的不到2英尺，可见当时氏族、部落间的关系已经极其密切，也可以推测这些先民已经初步具有了人类特有的表情达意的交际符号系统即语言。

与现代人类起源单源说相呼应，近年来在语言学界兴起了“语言起源一源论”。其实，这种理论早在20世纪初就由意大利语言学家A. Trombetti提出。至于把语言的各种分支追溯到1.5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是在30多年前由以V. Illiž - Svitý (1934. 9. 12—1966. 8. 22)和A. Dolgopolsky、Vitaly Shevoroshkin等为代表的一批苏联和俄国语言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欧亚大陆的语言同属一个庞大的欧亚超级语系，称之为“诺斯特拉语(Nostratic languages)”。“诺斯特拉”一词源出拉丁语nostrās，意为“吾(土)”，是由丹麦语言学家Holger Pederson开始使用的，用以指称印欧语系和可能同印欧语系有亲缘关系的其他语系的语言。这个大语系包括了阿非罗—亚细亚语(闪—含语)、卡尔特维里语、印欧语、乌拉尔语、达罗毗荼语、阿尔泰语。这一理论引起西方特别是美国同行的兴趣，并且扩大了比较的范围。最近去世的著名美国语言学家葛林堡(J. Greenberg)曾对非洲语言的分类作出过卓有成效的贡献，并长期与M. Ruhlen等致力于美洲语言的研究，将其分为三大类，即美洲印第安人所说的“美印语”(Amerind)、爱斯基摩人和阿留申群岛人所说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西北海岸印第安人所说的Na—Dene语。这个假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获得分子生物学证据的支持，但到了90年代中期以及随后几年则在遗传学界和语言学界引起了激烈争论，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美洲印第安人源于20 000~40 000年前从西伯利亚进入阿拉斯加的共同祖先，这些人后来可能从阿拉斯加走向北美、中美和南美。葛林堡提出了欧亚超级语系的假说，认为印欧语、乌拉尔语、阿尔泰语、楚克奇—堪察加语、爱斯基摩—阿留申语以及尤卡吉尔语、尼夫赫语(吉尔亚克语)、朝鲜语、日语、阿伊努语彼此之间都有比较密切的亲缘关系，组成一个称为欧亚大语系的语言集团。至于诺斯特拉大语系，按照Alan R. Bomhard的说法，应是一个包括欧亚超级语系在内的更大的语言集团。不属于欧亚超级语系，但仍是诺斯特拉大语系的成员有亚非语系、埃兰—达罗毗荼语、卡尔特维里语和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语等，它们同欧亚超级语系的成员在较远的层次上也有亲缘关系^⑦。

除上述诺斯特拉语系和欧亚超级语系之外，俄国学者S. Starostin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汉—高加索语系”的概念，把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塞语包括在内。这个语系又可能与美洲印第安语的Na—Dene语系有关，故被称为“Dene—高加索大语系”。美国学者D. Bengtson最近更把法国和西班牙边界地区的巴斯克语、巴基斯坦的Burushaski语及古代的苏美尔语等语言的材料加入进去，从而为汉藏语具有更远古的语源关系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

原来被纳入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卡岱语)，按某些语言学家的看法，与南岛语系有亲缘关系，可以合并为澳台语系，而澳台语系又与南亚语系、苗瑶语具有上位的亲缘关系，

Ilia Pejros 等语言学家将其称为南方大语系 (Austrie)。

在把语言学和考古学的新成果进行整合方面,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伦弗鲁 (Colin Renfrew) 在 1987 年出版的著作《考古学和语言》可以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本书的主题是探讨印欧语系语言的起源问题,作者认为该语系的语言并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随着农业的传播而传播的。农业对人口密度的支持要比采集渔猎经济的支持大许多倍,当农耕占有新的地区时,农民为了建立自己的新家园,必然会使农业在一种“前进波”中渗入新的疆土,从而带动了语言的传播。在印欧语系和南岛语系的由来和扩展、传播方面,近十多年来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如印欧语系,有的学者主张产生于西南亚洲及其附近,这是一个农业核心地区,从广义上说,该区自东南欧和利凡特地区至印度西北部,可能是印欧语系、高加索语、埃兰—达罗毗荼语和亚非语系的起源地。澳大利亚学者 Peter Bellwood 认为,南岛语的故乡与东南亚农业核心地带是相一致的,卡岱语也出自这个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岛语从亚洲扩展到大洋州和非洲。上面谈到的关于超级语系或大语系的研究,虽然在语言学界颇有争议,但受到这些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及部分遗传学家的欢迎和支持。比如根据遗传关系的鉴定,讲亚非语系语言、印欧语系语言和达罗毗荼语的人群之间有密切的遗传一致性,这显然与“诺斯特拉”假说是一致的。在南岛语系的起源问题上,最近遗传学家通过对 Y 染色体的研究^⑧,认为东南亚地区(包括华南)提供了移民的遗传资源,一支迁往台湾,另一支以东南亚岛屿为中转站迁往波里尼西亚。这一新说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⑨。

在探索基因、语言和民族起源的相互关系方面,遗传学家卡瓦里—斯福尔沙 (Luigi Luca Cavalli - Sforza)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位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的意大利裔学者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开始考虑一项宏伟的计划:重建人类各民族的起源地及由此而扩展到世界各地的途径。他领导的研究组走遍世界搜集 DNA 资料,通过计算机把它们同历史、考古和语言资料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各个民族族群的迁移、基因流和语言的关系。他们的工作证实了:人类基因的地域分布同语言的地域分布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互伴随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根据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或所属的语系来辨别其在遗传上所从属的种族。他还提出了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 (HGDP),其目标正是要揭示世界上不同民族生理、生化差异的遗传背景,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他在 1985 年倡导了有关中国人的姓氏与遗传基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并与中国科学家合作进行“姓氏基因”的科研项目,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

对于进化语言学 (evolutional linguistics) 的研究者来说,卡瓦里—斯福尔沙和葛林堡、伦弗鲁分别是群体遗传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三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作值得仔细阅读和研究。

中国学者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自然是中华民族和汉藏语系的起源问题。从考古学上说,所谓“考古学文化”是不同的族群的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应该是表示一定地区内独特地存在着的族群的共同体。古人类学资料已经证明,在现今中国及邻近诸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几个种族与民族的形成中心,如黄河流域的居民属于太平洋蒙古人种东亚族群;山东沿海(大汶口)居民有南蒙古人种向澳大利亚人种过渡的种族特征;甘肃境内的居民则表现出与中央亚洲和西伯利亚东南部相联系的大陆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也有可能与欧罗巴人种群体有过接触等等。但总的说来,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系各族、南岛语系各族的蒙古—澳大

利亚人种 (Mongoloid - Australoid hybrid forms) 有联系, 这必然会在语言上有所反映。汉藏语与侗台语、南亚语、苗瑶语、南岛语有非常密切的相互影响的关系, 虽然未必是传统意义上的发生学关系。

如果再往上追溯, 根据基因研究, 东亚地区南方人群遗传多样性非常丰富, 而北方人群则相对较少, 在 Y 染色体单倍型上仅拥有南方人群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推测, 现代人在东亚的最早迁徙是由南向北。我们的非洲祖先到达亚洲后可能首先居住在东南亚一带, 而后逐渐向北迁徙, 跨过长江、黄河, 北及西伯利亚。语言学家把南亚语、澳台语 (包括南岛语、卡岱语)、苗瑶语归入南方大语系, 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正如 Bellwood 所指出, 从东南亚北部大陆北至黄河流域的农业中心地带, 不仅是一个农业的故乡, 而且是一个语言的故乡。而汉藏语的形成地区, 可能距南方大语系的起源地相当近, 汉藏语一方面受到南方诸语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与欧亚大陆北方诸族的语言有某种渊源关系。

汉语和藏语同源关系已为绝大多数语言学家所认可, 俞敏教授所说的“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 也得到了遗传学证据的支持。通过对中国、泰国、缅甸、印度等国说汉藏语言的 607 位男性 Y 染色体上微卫星位点等的相异研究^⑩, 可以推测大约生活距今 10 000 年前黄河中上游地区、具有东亚最早新石器文化的居民是现今汉藏语各族的祖先。后来藏缅语族人群与汉语人群相分离, 其中一部分向南迁徙, 另一部分则与来自中亚人群的因素相融合, 成为现代藏族人的祖先。

近来大量的遗传学研究成果与“欧亚超级语系”的假设一致^⑪, 广袤的欧亚大陆一直是各个说不同语言的民族活动的舞台, 随着早期牧人的流动, 东西方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与传播, 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之前。如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同中国商文化的联系, 早已为广大研究者所了解; 中国和日本学者对山东临淄一汉代人骨的研究认为^⑫, 2 000 年前的临淄人与现代中亚和西亚人关系最近。而中国新疆等地区从远古到中世纪早期的人种状况, 是欧罗巴型人种占优势。古代印欧系语言, 主要是吐火罗语言, 稍后还有印度—伊朗语族诸语, 与主要是蒙古利亚人种类型诸族所说的汉藏系语言也有联系。中亚居民与东亚北部某些居民在遗传学上存在类似性, 这说明中亚地区的资料在研究东亚民族和语言的起源问题上具有极端重要性。根据 1997 年的报道, 高加索人可能曾迁移到欧亚大陆极东的地方, 甚至远达美洲。至于汉藏语和阿尔泰语系诸语之间, 似乎也不能排除存在着一定亲缘关系的可能性。阿尔泰系诸语可能是分化较迟的语言, 如果“阿尔泰语系”这一概念可以成立, 估计其形成的时间不会超过四千年。欧亚大陆还存在一些相对孤立的语言, 如古代匈奴人所说的叶尼塞语^⑬, 也可能与汉藏语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不妨把汉藏语看作是连结欧亚大陆北方诸语言和南方诸语言的桥梁。

总之, 通过基因分析, 结合群体遗传学和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 我们将逐步弄清欧亚大陆说同一语系和不同语系语言的族群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以及这种亲缘关系的性质, 因此对汉藏语系的起源问题, 应该在世界范围里, 从史前全球语言联系特别是欧亚大陆的语言接触的角度重新审视。这方面的探索从语言学史来说还是刚刚起步, 我们只是在这里提出问题, 期望在新世纪里获得长足的进展^⑭。

注 释

- ① Zhu, R. X. et al. Earliest presence of humans in northeast Asia, *Nature* 413, 413 – 417 (2001).
- ② Chu, J. Y. et al.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populations in Chin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95, 11763 – 11768 (1998).
- ③ Su, B. et al. Y – chromosome evidence for a northward migration of modern humans into Eastern Asia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Am J Hum Genet* 65 (6), 1718 – 1724 (1999).
- ④ 柯越海等:《Y染色体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科学通报》46(5), 411 – 414 (2001)。
- ⑤ Underhill, Peter A. et al. Y chromosome sequence vari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populations, *Nature Genetics* 26, 358 – 361 (2000).
- ⑥ 王士元等:《语言的起源及建模仿真初探》,《中国语文》总282, 195 – 200 (2001)。又见于《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280 – 298。
- ⑦ Bomhard, Allan R. *Indo – European and the Nostratic hypothesis*, Charleston, S, C: Signum, 22 (1996)。参阅王钢:《语言起源的一源论》,《外语教学与研究》总98 (1994), 34 – 42。江荻,《20世纪的历史语言》,《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55 – 166。
- ⑧ Su, B. et al. Polynesian origins: Insights from the Y chromosom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97, 8225 – 8228 (2000).
- ⑨ 请参阅《语言暨语言学》(*Language and Linguistics*)第2卷第1期“问题与讨论”专栏文章6篇和附载1篇。最近出版的*Nature*上也有几篇相关的论文。
- ⑩ Bing Su, Chujie Xiao. et al. The Eurasian Heartland: A continental Perspective on Y – chromosome diversity, *proc Natl Acad Scii* 107(6), 582 – 592(2000).
- ⑪ R. Spencer Wells. Et al. The Eurasian heartland: A continual perspective on Y – chromosome diversity, *Proc Natl Sci USA* 98. 10244 – 10249(2001).
- ⑫ Li Wang. Et al. Genetic structure of a 2500 – Year – Old Human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Spatiotemporal Changes, *Mol Biol Evol* 17(9), 1396 – 1400(2000)。对此有不同意见。参阅韩康信等:《山东临淄周一汉代人骨种族属性的讨论》,《人类学学报》第20卷第4期,282 – 286(2001)。
- ⑬ Vovin, A. Did the Xiong – nu Speak a Yeniseian Languag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4 (1), 87 – 104 (2000).
- ⑭ Greenberg, Joseph H. The Methods and Purposes of Linguistic Genetic Classification,将刊于《语言暨语言学》2(2) (2001)。

参 考 文 献

- [1] R. L. Cann, Genetic Clues to Dispersal in Human Populations: Retracing the Past from the Present, *Science* 291 (2), 2001, 1742 – 1748.
- [2] L. L. Cavalli – Sforza, Paolo Menozzi, Alberto Pizza.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3] George Van Driem, A new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Indo – 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Bulletin* 18, 1999, 43 – 58.
- [4] Harold C. Fleming Joseph H. Greenberg: A. Tribute and Appraisal, *Mother Tongue*, VI, 2000 – 2001, 9 – 27.
- [5] J. H. Greenberg, C. G. Turner, S. L. Zegura. The settlement of the Americas: a comparison of the linguistic, dental and genetic evidence, *Current Anthropology* 27. 1986, 477 – 497.

- [6] I. I. Ivanov, Tokhary, *Vostochnyj Turkestan v drevnost*, Moscow, 1992, 6 – 31, 550 – 555.
- [7] Victor H. Mair, 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1998.
- [8] James A. Matisoff, on “Sino – Bodic” and other symptoms of neosubgroupitis, *BSOAS*63(3), 2000, 356 – 369.
- [9] P. Mc Convell and N. Evans, eds. *Archaeology and linguistics*,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0] E. G. Pulleyblank, Early contacts between Indo – Europeans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1 – 24, 1996.
- [11] J. H. Relethford, *Genetics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 Human Origins*, New York: Wiley, 2001.
- [12] Colin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 – European origin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87.
- [13] Laurent Sagar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9.
- [14] W. S – Y. Wang, ed.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No. 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
- [15] Tandy Warnow, Don Ringe and Ann Taylor, Reconstructing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natural languages, *proceedings of the ACM – SLAM Symposium on Discrete Algorithms*, 1996, 314 – 332.
- [16] Zhengzhang Shangfang,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Collection d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52000.

(作者：徐文堪，男，1943年生，浙江湖州市人。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审、四川大学兼职教授。
邮编：200001)

Origins of Sino-Tibetan and Prehistoric Language Contacts in Eurasia

Xu Wenk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Prof. Rebecca L. Cann, for most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fields of genetics, linguistics, and archaeology evolved in parallel, and only in the past 15 years has a substantial change, referred to as the “Emerging Synthesis” by archaeologist Colin Renfrew, been attempted. Archaeological, linguistic and genetic evidence has suggested that the human population experienced an expansion in the last 100 000 years, spreading rapidly to its current worldwide area of occup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study of mitochondrial and autosomal DNA, attention has recently focused on Y-chromosome variation. Now, we can speculate that human language originated perhaps as recently as 50 000 or 60 000 years ago, with the emergence of our Most Recent Common Ancestors (MRCA). Humans leaving Africa for Eurasia may have taken a coastal route across Saudi Arabia, through Iraq and Iran, to Pakistan, along Indian coastlines, and then further across East Asia until they reached Southeast Asian island regions that

were in various stages of sea level change. Today, these regions are settled by people speaking mainly the Pacific, Austric, and Eurasian language superfamilies, and account for most of the world's current population. It is now universally accepted that the Han dialects (Sinitic languages) are genetically related to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constituting the core of the Sino-Tibetan family of languages. Beyond this relationship,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consensus. To begin with, there is the decades-old debate on the other two groups Prof. Li Fang-kuei included with Sino-Tibetan: the Kam-Tai and the Miao-Yao. Rival theories place them in other language families. As for the more distant relatives, there are some hypotheses. According to the new view of Prof. S. Starostin, the Sino-Tibetan proto-language is a branch of the Dene-Caucasian phylum of Languages. It is said to include the Basque, the Burushaski, the Ket (a Yeniseian language), some of the languages of the Caucasus mountains, the Na-Dene languages of North America, and Sino-Tibetan. Proto-Chinese later came into contact with Austro-Asiatic and Austronesian languages, which resulted in Sino-Tibetan borrowings in Austric (Miao-Austro-Asiatic and Tai-Austronesian) and Austric borrowings in Chinese. Sino-Tibetan languages seem to have been spread through a much wider territory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On the origins of Sino-Tibetan, further research will reconstruct proto-language, based on the data of Eurasian linguistics, archaeology and genetics. This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makes it possible to penetrate deeper than ever before into our remote past.

Key Words: Sino-Tibetan family of languages Eurasia Continent Origin

朝鲜开国神话中的中华文化痕迹

高伟浓

【提要】本文通过对古朝鲜的开国神话的形态和用词属性的分析，发现其有较强的中国化色彩，从而揭示中华文化对朝鲜半岛的早期影响。

【关键词】朝鲜神话 中华文化 中朝关系

东方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开国神话（亦可称“国祖神话”），描述本民族的“国祖”开天辟地、创立国家的传说故事。古代朝鲜民族也不例外。从广义上讲，古朝鲜的开国神话共有六种：檀君神话以及新罗系统的朴赫居世神话、昔脱解神话、金闾智神话、驾洛之首露神话与高句丽的朱蒙神话。对这些神话本身的价值，民族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早有深入的研究。本文仅拟通过这些神话记载探讨一下中华文化对朝鲜半岛的早期影响。

一、檀君神话

《檀君》神话的大致内容为：恒雄为天神恒因庶子，欲下凡。天神乃定三危、太伯两地为恒雄下凡之处所，并赐“天符印”三颗，以为天上神仙之标记。雄乃率徒三千降太伯山顶（据云即今之妙香山）一神檀树下，建“神市”，称“恒雄大王”，并设风伯、雨师、云师等官职，专司农业、疾病、刑罚、善恶等人间三百六十余事。

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往祈恒雄，望雄化其为人。恒雄便送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乃收而食之。熊遵嘱，忌三七日，化为女身。而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但熊为女者，无以为婚，故每望檀树之下，咒愿有孕。熊乃假化而与之婚。孕生子，号曰檀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辰，都平壤城，始称朝鲜，在位一千五百年。后隐居于阿斯达为山神，终年一千九百零八岁^①。

对这个神话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衍生出不同的解释。如社会进化学者对神话中每一“构件”均对应于社会进化之每一物象：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反映其时氏族公社的流动，或反映氏族公社之间的征伐交战；风伯、雨师、云师等——反映农业为主的社会与国家的形成；恒雄为天帝之子——对族长或酋长一类氏族或部族首领的神化；虎熊共居一洞——反映分别以虎熊为图腾的两个氏族或部落的关系；熊女恒雄之婚与虎未变成人——反映两个血缘相近氏族在合并为一个部落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变化，熊图腾氏族取得主导地位，合并后

的部落酋长亦出自此一氏族^②。

檀君开国的神话最早见于高丽王朝忠烈王年间僧人一然在1278—1283年间撰写的《三国遗事》和高丽学者李承休（1224—1301）撰写的《帝王韵记》。此后有关檀君朝鲜的史书和论著寥寥无几，只有朝鲜王朝世宗时期权览的《制应诗注》、端宗时的《世宗实录》、成宗时的《东国通鉴》（1485）、中宗时的《新增东国輿地胜览》（1531年刊行）、宪宗时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肃宗时的许穆（1595—1682）和朝鲜王朝实学家李翼（1681—1763）和安鼎福（1712—1791）等人的著述略有提及。

近代以来，从不同角度、不同历史观出发研究檀君神话的著述不知凡几。否定、贬低其历史价值者有之，肯定其真实性者有之，在此重复这些成果显属多余。但笔者认为，对檀君神话的研究远未划上句号。

一个较新的研究成果为牟元珪先生对檀君开国神话的阐说。他认为，檀君神话当始于高丽末期。而直到高丽中期也只有“平壤仙人”（王俭）的传说。理由是，宋人徐兢宣和五年（1123）出使高丽，后据其见闻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建国”一节仅记箕子朝鲜和朱蒙建高句丽的传说，如果徐兢听到檀君开国传说是不会不记的。妙香山传为檀君降生之地，然高句丽史家金富轼撰《妙香山普贤寺碑》也无一言述及檀君。后金富轼撰《三国史记》亦仅云：“平壤者，本仙人王俭之宅也。”牟先生认为，檀君神话是以中国历史文化为其背景的。13世纪70年代以后，高丽处于元朝压迫之下，元对高丽先采取高压政策，尔后转为和亲怀柔政策。但是，高丽向以继承正统华夏文化自居，对于文化落后的蒙古人则加以蔑视，在此背景之下出现檀君开国传说，其寓意是不难想见的。《三国遗事》称檀君与中国唐尧同时，其用意无非是表示立国之悠久、文化之优越，并借以唤起民族自尊心。平壤是高丽的西京，地位仅次于首都汉城，后为蒙古占领，置东宁府（后改为路），而称檀君定都平壤，乃欲借以唤起民族之觉醒，牢记祖先的发源地。所以，檀君神话传说是韩国民族精神的产物，与中国“尊王攘夷”的正统思想是相吻合的。不过，牟先生也认为，将檀君传说视为信史固然可笑，但一笔抹杀也有失偏颇，因为檀君神话背后隐藏着重大历史事实^③。

笔者赞同牟先生关于檀君神话的出现意在唤起国人民族自尊心，并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观点。但这样一来，有一个问题就值得深入探讨：高丽末期的檀君神话是时人的“原创”，抑或是时人在既有传说的基础上的“再创造”？如属后者，则既有传说中有无檀君之名及其故事梗概（哪怕是最简略的故事梗概），抑或是根据“平壤仙人”传说直接加工而成？

笔者认为檀君神话是在民间既有传说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根据“平壤仙人”直接加工而成的可能性不大（但“平壤仙人”传说的一些重要因子极可能被嵌进了檀君神话中），更不可能是“原创”性作品。徐兢之书没有收录金富轼所撰之碑文并无提及檀君传说，并不能证明檀君神话压根儿不存在。要不，当时存在的诸多其他神话传说在徐、金之书（文）中也只字未予提及，将作如何解释？因此，徐、金之书（文）未提及檀君神话说明可能是因为它当时在民间传说的范围尚小、影响不广。后来人们因唤起民族感情的需要而将这则在民间传说范围尚小，影响不广的神话搬出来加以放大，实在是一宗巧妙的“政治炒作”。纵观历史，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或言之，利用已有民间传说，大造舆论，影射朝政，唤起民族感情，不是高丽人的发明。当然，历史上“炒作”一宗民间传说往往经过一番“包装”，以适合“炒作者”的现实需要。具体到檀君神话的“包装”，主要是嵌进已有的“平壤仙人王俭”、